

移民岁月

第 5 期
YI MIN SUI YUE

创业者口中的西北轴承厂

——宋远英的记忆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50年前的“大三线建设”，提出了“靠山、隐蔽、分散”的布局要求，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不断来到西部地区。西北轴承厂，是迁建宁夏的早期三线建设的重要军工厂之一，从大连的瓦房店迁到宁夏。1965年10月，25岁的宋远英同志随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宁夏，她是首批次13名人员中的女性之一。当时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来到了宁夏，他们离开大连没有怨言，这一切是为了祖国的建设。

20世纪60年代，国家实施“大三线建设”，开始对重要的军事工业重新战略布局。落户于宁夏的西北轴承厂，就是这个大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宋远英对宁夏最初的记忆是荒凉，当时银川城里的二层楼是数得着的几栋，大都是土房，像农村，不像城市。银川老城的宗睦巷13号，一度成为他们一行办公的地方。西北轴承厂的选址，颇费些周折，选址本在“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最初选在银川通用机械厂，因离城市太近不符合隐蔽的建厂要求，第二次选在

青铜峡小坝，公路已经修好了，房子也盖好，但因风沙太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领导来小坝视察时，认为轴承厂房需要极强的密封性，那里的环境不适宜，会影响轴承质量。宋远英和同事又回到银川，考虑重新选厂址。

1966年的七八月份回到银川，重新选择厂址时，目标放在了贺兰山沿线。三关口那一带，他们也曾经踏勘过，小水沟、榆树沟都去了，后来就到了大水沟。大水沟当时没有路，但沟里的流量挺大的，水特别清澈。勘察队采集了水样带回银川化验，化验结果什么沉淀物都没有，水质很好。为了慎重起见，弄清地理环境，包括雨水、气候等，考察队还翻阅了《平罗县志》，获取地方史料记载，作为判定选址的地理背景。之后，西北轴承厂址选在大水沟，自治区同意批复建厂用地。

厂址定下来，就要在这荒凉的山谷中建厂。开始“搞三通”，通路、通电、通水，然后开始招工，主要在平罗县招人修路、架线，从西大滩一直修到大水沟，架线修路同时并进。往西大滩通路，主要是利用铁路运

输。同时，在西大滩修建仓库。之后，从瓦轴调来了几辆汽车，热火朝天开始建设。

1967年，开始基建。首先是招收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主要是宁夏当地人，银川、中卫、青铜峡、固原，当时大概有1000多人，大连那边技术人员、职工来了1000多人，没有带家属。西大滩的建设搞好了，路畅通之后就可以往大水沟运输材料和设备。轴承厂的规模，有备料车间、干车间、热力车间、保持架车间、钢球车间等七个分厂。1970年，主体建设已经建成试产。服务设施，商店、学校、医院、浴池都持续跟进，文化生活丰富，文艺、体育、京剧、评剧、影院都有，当时西北轴承厂的电影院比外头电影院修建得还好。

西北轴承厂在大水沟的时间，从1965年到1985年，大约20年光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筹划迁厂事宜，实际上1981年已经开始在银川招生了，当时银川新选厂区，就在长城机床铸造厂附近，地貌全是沙漠，不仅荒凉，还有一些坟地和沼泽地。1982年春天，

宋远英同志已从山里下来了，那时候银川厂区已经开始陆续建设新厂房，现在的西轴厂就是1982年开始建设的。到了1985年，大水沟的厂房住下搬迁的同时，银川的新厂房建成并开始投产。搬出大山，到了银川平原，那时候条件已经没有刚开始大水沟选址那么艰苦了。这时候厂子规模最大，效益好，全厂有60多个中层部门。最辉煌的时代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1996年，西北轴承厂上市，叫“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西轴以前可是香饽饽，大伙都想进来，因为经济效益好，除非对调，不然根本进不来。那时，一听谁在西轴工作，那就羡慕的不得了。现在，已是时过境迁。

现在，与宋远英当年同一批来宁的13个人，只剩下5个人了。宋远英回想起50年前第一次去大水沟勘察时的情景，很感慨，因为与她一起奋斗过的人，很多都埋在了贺兰山下。但她无怨无悔，把他们一生献给了西北轴承厂，献给了宁夏的建设事业。他们的根，永远扎在宁夏这片沃土上！（薛正昌 刘斌 整理）

宁夏电台初建的日子

萧法先

有房住。待大批队伍进入市内后，方知勇巷粮库有两栋空库房，既没床也没炕，为了照顾家人，只好男女混合住了，一家人一小片，中间挂一块床单，单身男女只好分开在两头睡了。

虽然生活条件差，次日大家仍然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去了，先前到达的安徽台干部已开始了采访、编辑工作，技术人员也日夜安装调试机器设备。经过数天的准备，10月1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试验播出。上午10时，成功地在南门广场城楼上实况转播了银川市各界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的盛况。虽然我们的播出人员与游行队伍非常陌生，但由于记者事先深入了解情况，介绍游行队伍的解说词竟没出一丁点差错。这不单是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首次大型实况转播，更是银川各界群众大规模活动首次在电台亮相，社会反响强烈。

电台试播后不久，临时党支部成立，摆在党支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安排大家的生活，没子女的夫妻安排在一间办公室，每户一小伙，单身集

中住在院内高台子上的一间小屋。此时天气突然变冷，安全过冬成了党支部的燃眉之急。我在银川跑了很多地方，本想先租点民房，但落空了。党支部反复研究后决定，动员大家动手，做土坯、盖房子，安全过冬。除留少数人维持播出外，多数人都投入到了建房工作。在西塔西北角的一片湿地上，我们填土搬土坯，干一天下来，人成了土人或泥人，晚上也没法洗澡，次日照常苦干。我记得于坎同志当时已年过半百，一次能背7块土坯（50多公斤）。从上海来的女同志，也不怕脏、不怕累，干得很起劲，那种感人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在寒冬来临之前，都能有个防寒避风的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苦干，80间房建成了，1958年11月7日这天，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自己的住房，搬进了自己动手建成的新居，别提多高兴了。乔迁时，不单没有汽车，连三轮人力车、两轮手推车也没有，自行车很少。有些人怀中抱着小

孩，手中牵着大点的子女，肩上背着衣被，一趟又一趟地搬东西。由于房子建在洼地上，房前有水坑，都要涉水，这些房子有顶没顶棚，有窗没玻璃，有门没有锁，屋内土成堆，院子更不平，白天没水吃，自己办广播，自己不能听，晚上点油灯，虽说没火炉，土炕热烘烘。为了解决吃水，在院子西头挖了一口土井，明知卫生指标很差，但毕竟能生活下去了，当时大家还算满意。次年春季，中广局支援数箱玻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支援电线灯600米，家家户户这才在窗上装上了玻璃，屋内安了电灯，大家更高兴了，至此，大家成功把家安在了宁夏，全身心投入到了电台的工作中。

转眼间，建台初期的艰苦日子已过去40年，许多共同战斗的同志也先后作古，尽管现在电台已面貌一新，大伙的生活也再没有缺这那的难处，但当年那种为了人民广播事业，不惜奉献自己一切的敬业精神，极为可贵，值得珍惜和发扬。

（摘自《守望新闻的岁月》）

往事回顾

马鸿逵部编外兵员的储存库——宁夏保安处

王有禄 罗新发

保安处沿革

宁夏省保安处，是马鸿逵编外兵力的储存库。不论蒋介石采取什么样的缩编手段来削弱杂牌部队，马鸿逵都能相应地把编余部队全部编入保安处，使马家军的实力不但完整无损，而且逐渐扩大。

随着保安部队的实力不断扩大，马鸿逵的儿孙们便借此为阶梯青云直上。他的儿子马敦静和马敦厚先后踏着这个阶梯当上了中将处长，并在此基础上相继被任命为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要职。马鸿逵的孙子马家骅刚放下书包，走出校门，即被任命为保安处所属的上校团长。1948年，蒋王朝临近覆灭时，马鸿逵把这支保安部队自编为相当于师的三个纵队，亮出了实力底牌，向国民党中央争要西北统治权。

保安处始建于1933年冬，当时以抵抗孙殿英为名，勒令各县紧急征兵3000人，编成相当于团的两个警备大队，由马全良任处长，韩进禄任副处长。在抗击孙殿英战役中，马全良负重伤；韩进禄阵亡，部队几乎伤亡殆尽。

1940年秋，调当时在一六八师任少将旅长的马敦静为中将保安处处长，马全良任副处长。马敦静任处长后，将自己曾在第六团当团长时带过的官兵全部带进了保安处，此时，保安部队增编为三个团。

1943年冬，马敦静调任十一军军长后，马鸿逵将其长子马敦厚，由当时的特务团上校团长一下子越级提升为中将保安处处长。马敦厚又把 he 原带的特务团、步兵大队、骑兵大队都并入保安处，这时保安部队突增至步兵5个团、骑兵1个

团。随后又将三十一师编余的两个团及贺兰山保安队（土匪郭枪子部）拨归保安处。这时保安处的兵力已达步兵七个团、骑兵一个团和一个保安队，约占当时马鸿逵部队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1946年秋，马敦厚调任骑兵整编第十旅旅长（后改为师），保安处长由王有禄接任。1948年秋，保安部队被改编成相当于师的三个纵队，骑兵保安团编为骑十师的第三十八团，保安处的编制至此结束。

据内部透露，1943年马敦厚兄弟的职位变动，实际上是内部实力的一次重新组合。马鸿逵的用心是：把在编的正规军统归其次子马敦静指挥，以便逐步扩大实力，为以后总揽宁夏军政大权铺平道路；将保安部队交给长子马敦厚，以平衡权力。

保安处编制概况

处设中将处长1人，少将副处长1人，少将参谋长1人。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医、军法6个处及政治部，分管作战、教育、情报、后勤、军需、军械等事务。

另有一个约50多人的秦腔剧团。所演全系古装旧剧，为马敦静任处长时创办的，当时在银川颇有名气。

保安部队

有直属特务连和通信排。下属团队有：

步兵保安团7个，番号为一至七团。骑兵保安团1个。贺兰山保安队。

武器装备

步兵团每团配备步枪1700支，轻

机枪97挺，重机枪12挺，八二迫击炮6门，六〇小炮6门。全处武器装备，约有步枪1.3万支，轻机枪710挺，重机枪84挺，八二迫击炮42门，六〇小炮58门，手枪四五百支。

防务部署及其主要活动：保安处是马家军看家的后备力量，一般很少动用。另外的三个据点是：

望洪堡。驻两个团，分布在望远桥至仁存渡、大坝至通宁堡的纵横线上。望远桥至望洪堡公路两侧，每隔五华里驻兵一连，除担任正常警戒外，还承担马鸿逵在河西寨、望远桥、大观桥、王太堡东寨及西寨5个别墅的值班任务。

掌政桥。这里滩道广阔，人烟稀少，并有通往盐池一带的重要渡口横城。因此，除派步兵一团驻扎外，骑兵保安团也经常驻此加强巡逻。

立岗堡。驻步兵一团，担任通昌、通贵、通义之线的河防警戒。

据点的各保安团、队，每年冬季黄河结冰后，便以连为单位，分驻沿河和渡口及其他要点，加强巡逻，至来年解冻冬马全放后，再以团、营为单位集中训练。

保安团、队与在编的国防军，在装备、训练、待遇方面完全一样。由于担任城防及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渡口、关隘的检查、警戒任务，有的要与军警联合稽查处的下属单位配合，因此，经常介入检查流动人口身份证、客籍人口居留证、货物出境证及粮食外运等工作。此外，还担任缉捕逃兵的任务。

查获的货物、粮食等，均要如数上交，马鸿逵对此很重视，经常查问。有一次宁夏的一个农民赶毛驴驮了一袋大米要去东山换羊毛蹄毡，被仁存渡稽查所查获后，便以“资敌”上报马鸿逵。马

当即批示：“人送保安处，粮收军粮局，驴交辐重团。”这人当下成了“三光”。

被查获的货物积少成多，相当可观。马鸿逵及其权贵们一见此财来得容易，个个垂涎欲滴，都想从点油水，于是一再下令加强检查，包括飞机、汽车均不放过。但检查重点，始终是以封锁陕甘宁边区为目的。

1940年秋，为了加强河防，保安部队奉命在黄河两岸沿大坝至通义之线，构筑“第二碉堡线”。碉堡重点为沿河各主要渡口和可能渡河的点。要求母碛和子碛配合，对渡河点构成纵深火力封锁网。

1943年秋，保安处被指定长期担任轮训永宁、宁朔两县保甲长及国民兵的任务。各保安团选派年龄较大的营副、连长、排长、班长等组成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小队（相当于排）等训练班子，分赴各县分期进行军训。每期训练结束时，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入编为基干民兵，组成若干队，担任本乡主要渡口、桥梁的检查工作。全省轮训的保甲人员和民兵总数约1.6万多人。这是兵源枯竭后采取“竭泽而渔”的又一苦害宁夏老百姓的恶毒办法。

1947年，马鸿逵为了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把两个保安团配属给暂九旅进犯盐池、三边。当时保二团进驻安边，保五团进驻盐池。这是第一次动用保安部队。1947年冬，马部驻盐池、定边的一六八师、暂九师救援榆林，由马宝林率保安三、七两团进驻三边，马全良率保安四、六两团去榆林。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马鸿逵将所部兵力扩编为三个军，七个保安纵队分别编入三个军内。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

张恭 整理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康滩乡泉眼山脚下、北黄河右岸、固海扬水工程首级泵站机房门外左前方。是为纪念党和政府为干旱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早日摆脱贫困缺水生活和恶劣生存环境而办的一件大事——固海扬水工程首级泵站机房竣工五周年而建。1991年11月落成。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黑伯理题词“千年黄河上高原”。

固海扬水工程位于宁夏南部清水河中下游地区，是集农业灌溉、人畜饮水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一体的大型电力扬水工程，直接自黄河提水。灌区范围包括固原、海原、同心、中宁等县的部分地区和国营长山头农场，是回族主要聚居区，也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属于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干旱荒漠区。清水河虽然流经本区，但水量少，水质苦咸；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高，含氟量高，难以利用。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人畜饮水十分困难，群众生活艰苦贫困，为了尽快改变这一地区的干旱贫困面貌，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时作出兴建固海扬水工程的战略决策，原国家水电部于1977年以水电规字（77）6号文批准初步设计，1978年6月1日正式开工，1983年部分通水灌溉，骨干工程于1986年9月竣工，历时8年3个月。工程设计流量每秒20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40万亩，装机容量7.8万千瓦，总扬程382.7米，11级场水，流程152.97公里至固原县七营乡。该工程是自治区“六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骨干工程总投资1.73亿元。

固海扬水工程建成后交付自治区水利厅固海扬水管理处负责管理。为铭记党和政府出资修建的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水利工程；缅怀前者，志在后人，固海扬水管理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集体创意、设计并组织施工，建树了这座纪念碑。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是

一个由三块下端流线、上端直斜线的长方体，以120度夹角构成的几何钢筋混凝土整体建筑，碑全高18米。碑体为白色，是由底部长1.5米、宽0.8米，顶部由长0.5米、宽0.4米的三块长方体呈“爪”形的碑墙实心相连，顶斜等高，高度14米。三块碑墙寓意工程以农业灌溉、人畜饮水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碑体三分之一处置——直径6米、高1.5米、厚0.3米的装饰圈，周围有反映工程测量、设计、施工、竣工剪裁、运行、灌区丰收景象的浮雕六组，浓缩了工程从勘测到运行的宏大生动场景，人景相融，栩栩如生。在碑体三分之二处置两块刻有叶轮形状、前后有水波浪纹的长方形装饰件，叶轮为蓝色，象征着巨大的水泵叶轮将滚滚黄河水从母亲河提上千年荒漠。碑体一面，嵌着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黑伯理“千年黄河上高原”七个金色大字。一侧有立碑单位水利厅撰写的碑文，铭记了工程基本情况。碑体顶部镌刻等高麦穗状花纹，象征灌区粮食上台阶。碑座是两层圆形平台组成，下层平台与上层平台中间设有种植花草的花池，碑座开有三个等距离五步踏台将上下平台连接，供游人上下，平台上置有栏杆。纪念碑投资8.3万元，修建历时1月余，1991年10月开工，11月竣工。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反映了广大回汉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团结一致，负重拼搏，务实苦干，开拓创新，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将滔滔北去的黄河水，引上南部的千年荒漠，刻画了广大水利建设者改造山河，改造大自然，造福西海固人民，创建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及固海扬水工程建筑，已成为黄河两岸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我国西部干旱沙漠地区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成就考察点之一，同时，也是进行革命与建设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石嘴山小煤窑的兴起

杨凤董 福云 口述 徐伯寿 整理

约在光绪十几年间，天津洋行在石嘴山纷纷设点，大量收购羊毛，其中英商八家，德商两家。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刺激了石嘴山地方煤矿的发展，其中杨家煤窑的规模最大。

杨家原是清朝秀才，有四子，老大杨发华、次子杨发荣、三子杨发茂、四子杨发胜。老三杨发茂经商有方，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他开办大商号发胜兴行，后来改称仁德堂。外号叫发胜杨。光绪二十年，杨发茂带着24岁的儿子杨作霖，在离新街三四里路的石喇叭处开煤窑。

当时杨家雇九十几个人，每天分两班，井上有6人摇辘轳提水。采煤工具全部是铁锤、铁镐、铁钎子。每班有2个工头领着干，工头有一定的技术，有权监督工人一般每10分钟从井下提一柳条筐煤、提两桶水上来。在井下，专门有从采煤工作面到井口的背煤工人，叫背手，每筐煤重200斤，每班每人一般背5筐。因巷道狭窄，背手拄尺把长的山水木拐棍，嘴叼油灯，缓缓爬行。每班定额约6000斤煤，全井每月产煤40余万斤。杨家煤窑的煤主要供应给当地的砖瓦窑、瓷窑或洋行。煤窑工人叫炭沫子。每个工人月薪八块银元，工头月薪十六块银元。管账先生是杨作霖的亲外甥，叫卢炳章。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因为巷道打到了河床，大水冲进煤窑，井下工人全惨死。杨急忙从天津买来“吸水龙”（即现在的抽水机），但因机器陈旧，又

不会维修，机器坏了不能抽水，杨只好在当年底关闭煤窑，历时23年。

在石嘴山开小煤窑的，还有一个与杨作霖同时代的头面人物叫董福生。

董福生原是清末平罗县衙门里的杂役，负责给县衙门运煤。同治年间，金积堡马化龙率领回民武装抗清时，曾一度围困平罗县，董福生秘密护送知县张某出城。清朝镇压回民起义后，经知县张某保举，董福生青云直上，成为平罗县一霸，被封为石嘴山的山头（官方的代理人），权力极大。凡在石嘴山地界开办煤窑者，他都要抽取二成的出窑煤，由此发财。一九二〇年董福生去世后，其子董二虎继承父业，对煤窑二八抽利。一九三七年，董二虎病死，董家势力才衰败。

石嘴山小煤窑除中国人开办外，外国人也插手经营。

解放前，石嘴山的小煤窑除几家大户外，多数还是几个人临时合伙采掘几年的浅煤窑。至今，在石嘴山还残留着许多煤窑洞口。

昔日石嘴山的煤，除供当地和平罗、黄渠桥、银川等地作民用燃料，或烧制砖瓦、陶瓷的燃料外，还通过黄河水运到内蒙古的五原、临河等地销售。每当夏秋时节，黄河之上一片繁忙景象。运煤的皮筏顺流而下，大木船则需十余人岸边赤背拖拽，烈日之下，汗水如流，十分凄惨。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